

爲自由獨立幸福的中國而奮鬥

王明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再版

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

陳紹禹
(王明)著

1. 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地位
2.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
3. 爲蘇維埃政權而戰鬥的九年
4. 新環境與中共爲新中國而奮鬥的新政策
5. 爲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

爲獨立自由之幸福奮鬥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月初版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再版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著者 王 明

發行者 南華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

香港皇后大道中

總經售 大公書局

三十七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

今年七月底八月初，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十五週年紀念。在第一次大會時，中國共產黨總共只有幾十個黨員。在一九二五年革命的前夜，就是在「五卅」事變以前，黨還不過只有不上一千的黨員（大約九百多人），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最發展的時候，黨有了幾萬黨員（大約六萬人）。現在中國共產黨不僅有幾十萬黨員，不僅在國內一部份領土裏領導着紅軍和蘇維埃，而且成爲團結全中國人民去實行抗日救國的發起者。

不錯，比起中國客觀條件的可能來，比起偉大的中國人民的需要來，特別是比起中國現在的空前民族危機的狀況來，中國共產黨十五年來爲解放中國和中國人民奮鬥所達到的成績，還是很小的和很不夠的。然而，中國共產黨在十五年過程當中

，能夠從很小的宣傳共產主義的小組，生長成爲真正羣衆的政黨；同時，全世界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力量，不僅不能消滅中國蘇維埃和紅軍，而且簡直無法停止中國紅軍和蘇維埃力量的增長；所有這一切，明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不可戰勝的力量。

爲什麼中國共產黨有這種不可戰勝的力量呢？首先因爲他是最先進革命階級的政黨，他百折不回地爲全體中國人民的基本利益而奮鬥，爲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而奮鬥，爲中國人民的獨立，自由和幸福而奮鬥，因此他就能取得廣大中國民衆的信仰和擁護。

一 中國國家和人民的地位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其領土面積只小於蘇聯。中國人民是地球上最多的人，差不多佔全人類五分之一以上，中國的文化，是全世界人類歷史上一種最古的

文化。中國人民，是愛好勞動，偉大胸襟和異常能幹的人民。中國人民當中，有許多偉大天才的思想家、哲學家、著作家、詩人、藝術家、軍事專家和發明家。然而在十九世紀時，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由於歐美資本主義的侵入東方，中國便暴露出了自己經濟上的落後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落後性。由於這種落後，我們中國人受盡了外人的打擊，首先是英國人打了我們（所謂一八四二年中英鴉片戰爭）；然後英國和法國人合同一齊打了我們（所謂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聯軍進攻中國之役）；然後甚至於三島小日本——幾千年來受中國文化培養薰陶的日本，歷史上尊敬中國爲「天朝」的日本，也打了我們一頓，（就是所謂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從此以後，特別是中日戰爭以後，中國的弱點完全暴露出來了，所以大家都看不起我們中國人，所以大家都敢於欺負我們中國人。因此，一九〇〇年的時候，西方和東方的大小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打我們中國人（即所謂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役）。在中國當時統治的腐朽的滿清及其精神上和肉體上都完全腐敗了的軍隊

，不能對於外國侵略者實行真正嚴重的抵抗，而滿清所實行的反中國和反人民的政策即所謂『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政策，更加緊了外國強盜對中國的侵略和壓迫。滿清在外寇的槍刀逼迫之下，簽訂了各種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條約，中國支付了而且到現在還在支付着大量的軍事賠款；根據這些條約，中國開闢了一切最好的江海口岸，讓外國的商品，資本和軍艦自由地侵入；根據這些條約，中國喪失了海關自主；根據這些條約，中國把最富藏的礦山都出租給外人成爲租借地，外國強盜們在中國整個活的肌體上實行分割，東西南北各方面的邊疆和藩屬都被割去了。外國強盜們把中國最好的地方搶去了，在那些地方開闢所謂外國租界，這些租界，無論在實際上，無論在『法律上』，都是國家內的國家，外國強盜們把中國的一切經濟命脈都搶握在自己手裏，他們在實際上監督着中國的財政稅收和進出口。在保護僑民生命財產的藉口之上，這些強盜們在中國的最心腹之地，經常地駐紮着大批的海陸空軍。這樣一來，中國人民最痛恨的外國強盜，把中國當他們自己的家裏一樣來

隨意支配，而我們中國人自己在自己的家裏，反轉來由主人翁變成了奴隸。於是中國由獨立國變成了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中國人由自由的人民變成了半殖民地的奴隸。因此，在最近一百年來。中國人民總是百折不回地爲解除自己這種被屈辱的被壓迫的半殖民地的狀況而奮鬥，這絕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同時，中國的生產力被最野蠻的君主政體和軍閥官僚制度束縛着。當時雖然在所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而且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但是，在中國原先統治着中世紀黑暗的滿清專制政體，然後除了辛亥革命後很短的時期試行民主共和外，又統治着封建性的軍閥官僚制度。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盡了各種可能的和難堪的義務，但是中國人民沒有最低限度的人權。因此，中國人民迫切地爲取得政治自由和人權而奮鬥。這絕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經濟的落後，民族的被壓迫和政治的黑暗，使中國走到一種非常貧弱的地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經常地挨餓受凍，每年有幾百萬人甚至幾千萬人因所謂天災（水旱

蟲災、傳染病等）而死亡而流離失所。中國的統治階級經常不注意建設真正合乎國家需要的國防力，他們把國家的收入多半用在無益的消耗和個人私囊，因此不能建立強有力的軍隊去抵抗外國敵人的侵略；因此，中國就變成了外國經常侵略和進攻的對象。而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人民異常迫切地找尋各種方法和道路，以便把貧弱的中國變成豐強的中國，就是使中國變成人民無飢寒交迫之苦而能過飽暖生活的國家，以及使中國變成有充足的國防力，能夠打退一切外敵進攻和保護自己的每寸土地和每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國家，中國人民迫切希望中國由貧弱變成富強的國家，以便能享有幸福的生活，這完全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在中國近百年史的篇幅上，充滿了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鬥爭。農
民革命的太平天國（一八五〇——一八六五年），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起義，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九年的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中國人民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具體反映

。而在一九二〇——二二年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而奮鬥的先驅戰士了。中國共產黨十五年奮鬥的歷史，雖然在中國革命各個階段和時期中，根據主觀及客觀條件的變動，有過各種政策和策略上的變更，但實際上就是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十五年的歷史，這當然絕不是偶然的一回事。

二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

中國共產黨是科學共產主義的黨，他與一切烏托邦學說和派別根本不同。他在決定每個國家革命鬥爭的戰略和策略時，絕不僅僅是從共產主義者自己的主觀願望和素望作出發點，而是根據這一個國家的特點，根據這個國家的民族的、經濟的、政治的、歷史傳統的、社會生活的、文化的各種條件的特點；根據每個國家每個歷史環境具體階級力量對比的相互關係；根據每個歷史時期中民衆政治覺悟性、組織性和戰鬥經驗的程度等。作爲決定自己戰略和策略的出發點。正因爲如此，所以中

國共產黨不僅自始至終完全了解和相信：只有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能夠把中國人民從被壓迫和剝削之下，真正完全解放出來；而且同時中國共產黨員也完全了解和認為有為中國人民利益的每一個進步的事業而奮鬥的必要。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還在其開始成立的時期中，不僅在政治上能把自己形成為承認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最後奮鬥目標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開的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而且能夠很快地規定出組織民主統一戰線，以及適合於當時中國廣大民衆需要的具體行動綱領（一九二二年七月在西湖開的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綱領，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上，中國人民在基本上就是為實現我們黨二次大會通過的行動綱領而奮鬥，即是為反對封建軍閥，為反對帝國主義，為中國民族國家獨立，為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為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投票的選舉權，為八小時工作制，為減租減賦，為取消厘金和苛捐

雜稅，爲男女平等和改良教育制度等等要求底實現而奮鬥。

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在廣東開的第三次黨的大會上，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領導和幫助之下，已經能夠規定出爲實現自己行動綱領底具體的政治的和策略的方針。這個政治策略方針的根本內容和特點，就是組織民族統一戰線去反對半殖民地中國底基本敵人——外國帝國主義。

一九二五年一月開的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進一步地肯定了建立反帝民族聯合戰綫政策的正確，總結了國共合作的初步經驗，嚴重地討論了黨的羣衆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農學生羣衆的問題，準備黨和羣衆去迎接行將到來的偉大的革命戰鬥。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政治協定，共產黨贊助國民黨改組，共產黨員加入當時代表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帝聯盟的國民黨，爲建立臨時革命政府，爲建立國民革命軍，爲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等而奮鬥；實行國民會議促進會運動，贊助國民革命軍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在反帝和反軍閥的鬥爭中，實行教育和

組織工農羣衆——所以這一切；都是當時中央運用民族聯合戰線策略的具體表現。

中國共產黨採取民族聯合戰線的策略，是完全自覺的。他之所以採取這種策略，首先就是爲的中國人民的利益，即是爲的打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爲的爭取中國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改善他們的生活地位。

雖然因爲民族資產階級叛變和離開了國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民族聯合戰線的策略沒有給我們預期的和應有的結果，但是，在當時發生的一切偉大的反帝反軍閥的政治事變中，共產黨員曾經表現出英勇奮鬥和不怕犧牲的模範。例如：在「五卅」事變中，在省港罷工中，在平定商團，討伐楊劉和討伐陳炯明的東江戰役中，在北伐中，特別是在佔領南昌的慘酷戰鬥中和佔領汀泗橋的血戰中，在收回漢灘英租界的羣衆行動中，在反對張宗昌和孫傳芳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中，中國共產黨員在實際上向中國人民證明了，他們爲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無限忠誠和堅強意志。

當農民運動發展成爲千百萬農民的土地革命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新的革命階段的基礎上，——即是在土地革命的階段的基礎上，繼續爲解放中國人民而鬥爭，中國共產黨把土地革命看作是動員和吸收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農民去實行民族解放鬥爭的方法，沒有農民參加，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把土地革命看作是消滅中國封建餘孽的工具，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就是這種封建餘孽的經濟基礎；軍閥官僚制度，就是這種封建餘孽的政治反映和上層建築。中國共產黨把土地革命，一方面，看作是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餘孽奴役中國人民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的工具；另一面，把牠看作是造成中國人民真正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自由發展的前提底方法。總而言之，中國共產黨把土地革命看成是有全民族和全人民意義的事業，經過牠，可以把中國從數千年經濟政治文化落後情形中解放出來，同時，並且能造成使中國成爲現代的文明國家的條件。

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在武漢時代，不僅自己宣佈實行土地革命的必要（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月在武漢開的黨的第五次大會），並且企圖推動武漢國民黨傾向贊助和擁護農民土地革命的道路。

因為汪精衛叛變和左派國民黨離開革命，中國勞動群衆根據其本身的政治經驗，更加相信共產黨員言行的正確；更加把中國共產黨看作是爲解放中國人民而奮鬥的唯一的、最徹底的力量。

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之所以遭受了失敗，主要地是由於下列原因：

- 第一，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在當時的力量比革命的力量還大些；
-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叛變；
- 第三，中國軍隊的僱傭性，以及在軍官成份中地主軍閥份子的影響佔優勢；
- 第四，陳獨秀等在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中所犯的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由於他們對於奪取國民革命軍及其軍官成份的工作，以及對於武漢工農和建立有共產黨員骨幹的真正的革命軍隊的工作，採取了最可恥的消極的和怠工的

態度，

帝國主義和封建制度在中國資產階級幫助之下，給與了中國人民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事業一個暫時的嚴重的打擊。然而中國共產黨員不顧一切恐怖和壓迫，不怕一切艱難和犧牲，在最困難最艱苦的條件之下，繼續進行組織勞苦羣衆的工具。準備爲新的光明的幸福的中國而戰鬥的革命新高潮。

三 爲蘇維埃政權而戰鬥的九年

武漢「左派」的轉變以後，在革命營壘中剩下的，只有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暫時得到勝利的反革命力量，對於革命的勞苦羣衆以及革命的學生和智識份子，尤其是他們的領導者——共產黨員、採取了「斬盡殺絕」的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的政策，同時，在共產黨員領導之下的工農，不僅不願不戰而降，而且用盡一切方法企圖保持革命既得的勝利和向前推進革命的事業。在那些工農羣衆革命鬥爭特別發展的區

城（如鄂湘贛粵等省），開展了廣大反對反動軍閥和地主的游擊戰爭，在那個時候（一九二七年秋冬兩季），農民武裝起義的地點是很多的；然而在全國革命形勢低落和殘酷武裝進攻情形之下，只有很少的地方能夠抵抗敵人的進攻和鞏固自己的陣地，這些地方不僅有强有力的農民組織和羣衆運動，而且有相當的革命軍隊作爲武裝力量的核心，同時，特別重要地，在這些地方，有那些天才能幹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作領導，例如舉世共知的毛澤東、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賀龍、方志敏等同志。一方面，由於在革命勝敗過程的痛苦經驗中，深刻認識了政權機關和武裝力量的偉大作用和意義；另一方面，由於保證順利進行自衛鬥爭的必要和準備對敵人實行新進攻，在許多共產黨地方黨部領導之下的工農羣衆，在一九二七年的秋末冬初，自發地組織了蘇維埃政權的萌芽形式和工農紅軍的最初隊伍。廣州公社就是革命退兵時最大一次的武裝發動，同時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工農羣衆，爲在蘇維埃旗幟之下解放中國人民的英勇企圖。廣州公社雖然遭受了嚴重的失敗，但牠所舉起的蘇維埃

的旗幟，確成了中國千百萬勞動羣衆奮鬥的旗幟。正因爲如此，所以一九二八年八月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第六次代表大會，堅決地承認現在階級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因爲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基本任務一個沒有解決，例如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封建餘孽消滅，八小時工作制等），但同時堅決號召全黨和全中國勞動羣衆爲唯一能夠救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而奮鬥。

從廣州公社到現在，差不多已經快有九年了。這九年，是中國勞苦羣衆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爲蘇維埃政權而戰鬥的九年。

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三〇年春，在全國革命浪潮暫時低落的情形之下，個別的初步的蘇維埃區域和個別的幼稚的紅軍隊伍，主要地進行了自衛的鬥爭。

可是在一九三〇年夏天，因爲全國的革命高潮的開始，蘇維埃區域和紅軍隊伍，才開始很快地鞏固和發展。雖然「左」傾的李立三路線，給了蘇區和紅軍發展以很大的危害和損失，但是黨很快地——特別是在一九三一年初開的四中全會上，戰勝

了盲動的李立三路線和反革命的羅章龍派。因此，最近五六年來，中國勞苦羣衆爲蘇維埃而戰的鬥爭，才得到了相當的勝利。在三四年的過程中，紅軍主力，在閩贛兩省很大一部份區域內，創造和鞏固了根據地。在紅色首都——瑞金——裏，開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開中央蘇區比較不大的領土內，在長期戰爭和經濟封鎖的困難情形之下，蘇維埃政權還能夠順利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實行了許多有益於國計民生的辦法。這些辦法是中國人的優秀份子幾千年來所夢想的辦法：沒收封建地主的土地並把這些土地無代價的轉交給無地少地的農民；消滅了中世紀的奴役的高利貸制度；取消了一切苛捐雜稅；實行了統一的累進所得稅；取消了帝國主義的特權；給了中國勞苦羣衆空前未有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權利；建立了最廉潔的政府機關（例如蘇維埃政府的一切工作人員，從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起，到技術工作人員止，其所得薪俸，不超過每個工人農民的收入；）組織了廣大的消費合作社——部份地也有生產合作社和借貸合作

社，以便利和改良居民的物質狀況；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以及社會保險和增加工資；實行了對農民由國家給與種子耕牛和工具的幫助；領導了春耕秋收運動；修理了堤防和改良了水利（由於這一切，所以在一九三二年閩、贛蘇區的收成，超過這些地方革命前收成相差百分之十五，在一九三三年則超過百分之二十五。）實行了廣大的消滅文盲的運動，並且開始實行普及的免費教育；開辦了各種高級及中級的和專門的學校，訓練了大批的軍事、及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工作人材；實行了男女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平等權利。在最近五六年來，武裝不好和給養困難的年輕的紅軍，順利地衝破了國民黨的六次大軍事圍剿。雖然國民黨在德國軍事顧問賽克特指使之下，採取了包圍蘇區和消滅紅軍主力的計劃，但紅軍在每個必要的關頭，能夠衝破敵人的封鎖線和保存自己的實力。在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間，紅四軍團能夠衝出國民黨層層包圍，實行從鄂豫皖蘇區向四川英勇的遠征，在那裏建立了新的蘇維埃根據地，這不僅對於紅四軍本身向前發展上，而且對於一切紅軍主方向西北集中問題上，

都有很大的意義。在一九三三年夏，紅二軍團在最困難的敵人包圍和嚴重的水災飢荒情形之下，能夠衝破國民軍的封鎖線，保存了自己的實力，並且創造了新的蘇區。一九三四年冬，閩贛紅軍主力，先後衝破了國民軍近百萬軍隊的包圍和重重的封鎖，在一年半期間以內，實行了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兩萬五千餘里的長征。從福建、江西出發，經過了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等省，達到了陝西、甘肅，在那裏創造了新的蘇維埃區域。在一九三五年冬，甚至所謂一個『童子軍』（紅二十五軍）在嚴冬情形之下，從鄂豫皖邊境也達到了陝北蘇區，與紅二十六軍匯合。紅軍九年來與國民軍的優勢力量鬥爭中，不僅沒有像中國人民的一切敵人所夢想的那樣被人消滅，反而從很小的游擊隊變成了幾十萬的正規軍；紅軍的每支隊伍時常都能衝破他們優勞兵力的包圍，經過沿途戰鬥，都能達到預先所計算的地點；——特別是紅軍主力，經過了中國中部、南部、西南和西北部十一省的疆土，經過許多人跡少至的崇山峻嶺，渡過許多素稱天險的長江大河（揚子江、烏江、金沙江、

大渡河等)。在嚴冬烈寒盛夏酷熱和飢餓頻仍的條件之下，在敵人前後上下左右空陸海軍追逐的情形之下，在今年二月，竟能出現於山西，爲着實現北上直接武裝抗日任務。所有這一切，不僅引起了我們的朋友的稱讚，而且引起了我們的敵人的驚奇；不僅引起中國人民的興奮，而且引起了全世界優秀思想者的讚揚。因此，甚至於國民黨南京政府的高級官吏如蔣廷黻先生等，也不能不不僅把這看成是中國共產黨力量不可戰勝的明證，而且還認爲這是「中國民族的偉大潛勢力」的證明。

中國紅軍和蘇維埃，不僅本身是反對中國人民仇敵（日寇）底一種最進步最澈底的政治軍事力量，而且是能够團結全中國人民和全中國軍隊去實行抗日救國的偉大力量。

九年來，中國共產黨爲拯救中國和中國人民而建立蘇維埃和紅軍的鬥爭，是一種很艱難困苦的鬥爭，而且直到現在，這種鬥爭還未能達到預計的和應有的結果。然而所有中國共產黨在九年來爲蘇維埃而奮鬥所作的一切，以及蘇維埃和紅軍在共

產黨領導之下所作的一切，已經不僅成爲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人民的有歷史意義的成績，而且已經成爲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爲蘇維埃政權和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極有價值的貢獻。

中國共產黨九年來爲蘇維埃的鬥爭及其結果，在一切人們面前明顯的證明下列幾點：

一、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對於自己的主義和思想以及對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唯一忠實的政黨，而且是不怕艱難，不怕犧牲，百折不回地與人民一起爲人民事業而實際奮鬥的政黨。

二、由中國共產黨所教育和組織的工農羣衆的政治程度和組織能力，已經發展到他們能夠開始組織自己政權和自己軍隊的程度，他們自己管理國家，他們自己解決自己的事務，他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不僅比任何中國軍閥，官僚要做得好，而且要比任何所謂先進的自由資產階級份子做得好。

三、蘇維埃區域的經驗證明說：中國共產黨員不僅善於破壞一切妨礙中國人民和國家進步的那些陳舊的腐朽的黑暗的東西，而且善於創造和建設真正光明幸福的新生活；如果中國共產黨員在握有小部份領土及有限富源的困難條件之下，在長期戰爭和經濟封鎖的艱苦條件之下，能夠作出中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事業：那末，如果中國共產黨員能夠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拿到全國的政權時，一定可以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生活中，創造出舉世未聞的奇蹟。

四、在中國空前的民族危機條件之下，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軍蘇維埃的力量，已經成爲全中國人民的民族之望和民族之光。現在每個能夠思想的人都不難想到，如果中國人民處在這種日寇不斷侵略的嚴重關頭，假若中國沒有强有力的共產黨及其紅軍和蘇維埃，如果沒有他們不屈不撓地爲建立抗日救國的全民聯合戰線而奮鬥，那末，全中國人民將會陷入何等失望和紛亂的地步！

四 新環境與中共爲新中國而奮鬥的新政策

一九三一年九月佔領東三省，一九三二年春進攻上海和吳淞，一九三三年春佔領熱河，特別是一九三五年秋以後，實際上搶奪了河北和察哈爾，積極準備佔領綏遠、山東、山西和福建，在武裝佔領區域和實際佔有區域內實行公開的殖民地的強盜政策，實行可恥的無限制的走私，瘋狂地準備實現一九二七年田中奏摺內所提的併吞全中國和獨霸全世界的計劃——所有這一切日本帝國主義在最近五年來實行的事變，引起了中國內外環境上極大的變動。中國外部環境的變遷，首先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不斷的侵略，不僅破壞了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九國公約，而且造成對英、美、法在菲律賓群島、印度、澳洲、安南以及整個遠東利益的直接威脅。這就不能不引起日本與美、英之間爲爭取中國和爭奪整個太平洋沿岸市場的鬥爭劇烈化。中國內部環境的變遷，首先是由於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直接的威脅着中

國民族的生存。在中國人民面前簡單明瞭地擺着兩條路：或者抗日，那就還能生存，或者不抵抗，那就只有滅亡。這就不能不引起中國社會中各階級和各階層相互間之關係的變更，這就不能不引起中國各黨派及其軍隊相互間之關係的變動，其結果也就不能不使他們趨向滅弱內爭和停止內戰，以便團結一切力量去反對共同敵人的道路。

中國這種外部內部的新環境，要求中國共產黨採取一種新政策來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這種新環境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提出一種直接而最重要的偉大歷史任務——團結全中國人民去為抗日救國而奮鬥的任務。

大家都曉得，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共產國際七次大會總的政治方針，曾規定了自己的新政策。去年八月一號，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共同簽名發表的有歷史意義的「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便是這種新政策的具體反映的開始。

在這個告同胞書中，中國共產黨不僅明確地說明了必須團結全體中國同胞去進

行抗日救國鬥爭的原則立場，而且同樣指出了組織這種鬥爭的唯一正確和有效的方——就是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在這個告同胞書中，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具體形式和內容：訂立各黨派抗日救國的政治協定，以便共同進行抗日鬥爭——從部份的行動起，直到共同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和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過去一年中，中國共產黨在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的宣傳和行動，雖然還未能達到預想的成績；但是，建立這種統一戰線的必要和認為這是抗日救國的唯一有效方法的思想，已經一天天的普遍到全中國各個社會階層中，成爲他們公認的思想，然而，這絕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和政策，已經不遇到各方面的各種反抗和反對了。事實證明：不僅各種敵人從「左」右兩方起來反對中國共產黨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而且甚至就在中國共產黨本身，對於這個新政策，也絕不是大家都有正確的認識和清楚的了解，正因爲如此，所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十五週年紀念和新政

策實行一週年紀念的時候，中共中央認爲有鄭重地向全黨和全中國人民明顯地說明建立民族反日統一戰線政策的性質和內容底必要。

(甲)關於反日統一戰線與一般反帝統一戰線的問題。

第一、中共首先說明的，就是中共希望的是建立反對日寇的民族統一戰線，而不是一般反帝統一戰線。

這就是說，中國人民鬥爭的鋒芒，只是對準現在階段上的死敵——日寇。

有些人從「左」方面來反對中共的這一政策，這些人之中，有些是拿我們黨的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作理由。他們說：「中共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曾指明要反對在中國的一切帝國主義的壓迫；」另一些人則高唱：「中國人民的民族革命戰爭，必須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或者，「中國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一定是反對在中國其他帝國主義的戰爭底開始。」

對於這些「左」傾空談家的論據，應當回答說：這完全是不對的。爲什麼因爲

(1) 我們黨六次大會開會時的環境，與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不同；那時候，國際帝國主義國家雖然相互之間有各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但在基本上，在華盛頓條約基礎上結成統一戰線來反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而現在日寇的軍事侵略，不僅威脅着中國人民的民族生存的權利，而且也直接威脅着一切與之競爭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遠東利益；(2) 爲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鬥爭的一般口號，這是一件事；中國人民以民族革命戰爭的手段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他一切帝國主義，這是另一回事。戰爭有而且應當有各種性質和各種形式，反帝國主義的武裝鬭爭，是被壓迫人民鬭爭中各種形式的一種，而且僅能是各種形式中的一種形式。此外，武裝鬥爭是這種鬥爭的最極端的形式和不得已的方法，而絕不是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反對任何帝國主義，都可以和應當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尤其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希望同時用武裝鬥爭去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因此，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的武裝自衛，不一定而且不希望

『成爲中國人民反對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軍事行動的開始。』

沒有一國人民願意戰爭的，我們中國人民也是一樣。如果所謂中日問題，能夠在不損失和保障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條件之下，而用和平方法解決的話，那麼，中國共產黨員，一定首先起來贊成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現在，如果所謂中日問題，結果終於不免引起中國人民武裝反抗日寇的軍事侵略，那麼，這絲毫也怪不得中國人民。

我們——中國共產黨員和中國人民絕不想對任何國家宣戰，然而，同時，我們希望別國也不用戰爭和侵略來威脅我們，以便我們能夠自由地生活。如果誰要企圖剝奪我們國家和人民最低限度的天賦的生存權利，那麼，我們便只有實行自衛了。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人民完全是迫不得已而起來用武裝力量去驅逐自己的死敵，以便保護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財產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國家。同時，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共產黨員希望盡可能地快些。少犧牲些，戰爭雙方血少流些，就能夠

達到『驅逐日寇出中國』的目的，這不僅合乎中日兩國人民的利益——我們相信，日本人民也和我們中國人民一樣是不願意戰爭的——而且合乎全世界一切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合乎直接有關係的英美法等各國人民的利益。

由此可見，這些少數的『左』傾空談家高喊：『必須同時進行反對日本和其他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或者『中國人民反對民族革命戰爭只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底開始』，不管他們自願地或不自願地，實際上恰巧是中了日寇的奸計。因為日寇恰恰是希望使中國人民在反日鬥爭中離開一切可能的同盟軍，而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

(乙)關於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及其他黨派合作問題

第二、中共公開指出：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的應當表現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及其他組織在共同的反日鬥爭綱領的基礎上訂立政治的協定，同時，保存各黨派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完全獨立性，這就是說：

(一) 成立共產黨，國民黨和其他組織之間談判和簽訂的政治協定基礎的綱領，應當是具體的和真正的反日鬥爭的行動綱領；

(二) 參加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產黨，國民黨及其他組織，都有全權保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政綱和自己的組織。無論參加統一戰線的那個黨派或組織，不干涉的且不應當干涉參加統一戰線的另一個黨派或組織的內部事情，任何一個參加統一戰線的黨派，沒有權利向另外一個參加者要求他拒絕或停止他的自己的思想和政綱的宣傳，或者要求他停止和拒絕他的自己的組織的發展；

(三) 對於我們共產黨員，就是說：在爲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或者已經建立了這種統一戰線的條件之下，我們不僅一分鐘也不應當允許減弱我們自己的共產黨及其組織，而是特別應當用盡一切力量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黨，更加保障黨的純潔和統一。

因此 必須堅決反對那些可以在實際上使共產黨與某種反日鬥爭的政治同盟相

混合的一切傾向，必須反對那些以爲可以不加選擇地允許一切宣佈贊成或實際參加反日的人入黨的提議。同時必須反對那些實際上可以造成重複一九二七年陳獨秀等機會主義錯誤的傾向，這種錯誤的實質，就是把共產黨參加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看作是拒絕自己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和政綱，拒絕對自己同盟軍和同路人的批評，隱藏自己的面目和旗幟，因而使共產黨喪失獨立性和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變成民族資產階級的尾巴。現在特別用一切方法鞏固和加強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必要，不只因爲在現在條件之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仇敵，可以企圖而且正在企圖打進共產黨的隊伍，以便在黨的內部來遂行其卑鄙醜惡的事情和破壞黨的純潔和統一，因此黨必須預防這一點；而且是因爲，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前途如何和成敗如何，以及中國人民解放鬪爭的前途如何和勝敗如何，首先就依靠共產黨的力量的一致以及紀律性和戰鬥性如何而決定；共產黨越有力和越鞏固，反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也就愈快和愈容易，中國人民抗日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也就越有希望和越有保證。由此可見

：更加鞏固和加強共產黨，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本身和工人階級利益的需要，而且是全體中國人民利益的需要。

有些人說：中國共產黨要求與國民黨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一種不能兌現的政策。因爲在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兩黨之間，存在着的只有歷史的仇恨，因此，在他們之間，根本談不上建立任何統一戰綫。

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中國共產黨認爲：中國人民的利益應當高於一切。現在，當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緊急關頭，必須團結一切力量去反對共同的仇敵。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不只是存在着歷史的仇恨，實際上，在國共兩黨之間，不僅存在着九年的歷史仇恨，而且還有差不多九年的（從一九一九年中國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日起，至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止）歷史合作。

我們共產黨員應該把國民黨和蔣介石不與日寇一樣看待，因爲中國人民的基本敵人是日寇，在現在階段上一切應當服從抗日。

此外，也不能把整個國民黨及其全體軍隊，看成是日帝國主義的同盟軍和助手；尤其主要的是，為的真正的和嚴重的武裝抵抗日寇，必須要國民黨的黨隊或其有決定意義的大多數部隊來參加。

我們——中國共產黨員是誠懇的革命家和慎重的政治家，絕不願中日寇挑撥中國內戰的好計。我們真誠地和熱烈地希望，把我們同胞的一切力量團結起來去反對外國的死敵。因此，我們要與國民黨和其他組織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既不是玩弄什麼手腕，也不是說什麼空話，而是真實的和誠懇的救我們人民與救我們祖國的政策。

至於講到國民黨方面對於共產黨建立民族反日統一戰線政策的關係，那就首先應當指出：如果認為整個國民黨都不願意和共產黨建立這種統一戰線，那麼，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國民黨是包括幾百萬人的黨的，國家機關的和軍事機關的組織，在這幾百萬人當中，不會找不出許多真正愛國愛民的和忠實於孫中山主義及其遺囑的人

，這些人不會不感覺到日寇所加於中國人民的民族侮辱和民族壓迫，這些人不會不想到如何實現孫先生『爲中國之自由平等』而奮鬥的目的，因此，不會不傾向於建立全中國人民反日統一戰線的思想。在國民黨黨員當中，不僅有成千累萬的黃埔軍官學校及其他軍事學校的學生，而且在這些人當中，有很多人還記得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時的光榮的革命傳統，有很多人直到現在還願意爲保國衛民而奮鬥。在國民黨黨員當中，有一些優秀的男女青年，他們真心地和熱烈地愛護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他們誠懇地準備着繼續中山先生遺志爲中國民族解放而奮鬥。在國民黨軍隊軍官當中，在國民黨黨部，政府機關和羣衆組織的工作人員當中。有不少真正愛國志士，他們真正痛恨日寇和準備與之進行決死的鬥爭，此外，即是在國民黨這的著名的政治的軍事的人物和社會活動家當中，也有不少這類的人，他們由於愛國愛民的熱忱，曾追隨孫中山先生爲中國自由平等而奮鬥數十年，他們對於自己的光榮的過去看得非常寶貴，他們回想起自己與國民黨在革命時代的過去情形感覺得光榮與自豪

，同時，想到國民黨現在情形和政策以及中國人民和國家所處的現狀，便不禁滿懷痛苦。在國民黨的著名人物當中，也有一部份這樣的人物：他們根據一種很簡單的——但確是正確的觀點而認為有與共產黨員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必要，即他們認為：共產黨員同樣是黃帝的子孫和後裔，共產黨員是中華民族的子女，而日本人不僅是外國人，而且是強盜和劊子手，因此，他們認為與中國共產黨員一起去反對外國的強盜和劊子手，總比受外國人來宰割我國家和魚肉我人民要好些和合道理些。因此，他們以為無論如何，絕不能與日寇聯合一致來反對本國的同胞——那怕這些同胞是共產黨員也好。此外國民黨的有些地方黨部和黨員，在國內外已經開始自動地與共產黨員和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及其他組織的份子，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特別重要的是，在東北四省中，國民黨員常是與共產黨員親密地携手共同進行抗日游擊戰爭。在國民黨的下層和上層中間，贊成與共產黨員和紅軍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傾向，以及贊成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聯俄，聯共，擁護工農群眾運動）的傾

向是日益開展着。

不錯，同時我們也知道，在國民黨中還有另外一種事實和傾向，就是絕不是所有的國民黨員都贊成建立抗日統一戰綫，尤其是在有一部分很有力量和很有威信的領袖當中，有一部份人對於與共產黨員建立抗日統一戰綫的問題，還表示動搖，還沒有決心，還表示害怕。而且可惜得很，直到現在，這一部份有力量有威信的國民黨領袖人物的這種傾向在國民黨中的影響還佔着優勢的地位，而正因為如此，所以不管我們共產黨員全國人民以及許多國民黨員和領袖如何熱烈地希望着，盡可能地很快地建立國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以便挽救我們親愛的祖國，但是，國共之間的抗日統一戰綫直到現在還未建立起來。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決定和創造歷史命運的，是千百萬民衆的意志和努力，而不是少數個人的意志和願望，在各國的歷史當中，我們曉得不少這種的例子：就是有時候，千百萬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可以逼使少數所謂領袖不根據而且反對着他們的意志和願望去行動，可以在他們面前明顯地

提出兩條出路：或者與羣衆一起，那他們就還能保持地位，或者脫離羣衆，那他們的政治生命也就隨之完結。對於國民黨的這類領袖和活動家，我們不僅希望歷史規律活動的力量，而且希望他們爲自己切身的利益和爲國家人民的利益而能夠改變他們對於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態度。

正因爲如此，所以從一九三三年起，特別從一九三五年八月起，中國共產黨，紅軍與蘇維埃再三向國民黨部，軍隊及其領袖（蔣介石也在內）提議建立反日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僅歡迎中國各界及文化界救國聯合會關於居間介紹各黨派加速進行關於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談判和協定的提議，而且歡迎和號召全中國民衆積極起來表示自己的意見，以便促進各黨派實行關於這種統一戰線的談判和協定。

另外有些人，用這樣的理由來反對我們建立民族反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就是他們以爲我們是重複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時期的陳獨秀等舊機會主義的錯誤。他

們說：這種錯誤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種錯誤會受到中共八七會議（一九二七年）六次全國大會（一九二八年）和共產國際六次全世界大會的嚴厲指責

對於這些實際上是關門主義者和空談家的『巧妙的』說法，中國共產黨員回答說：這是不對的。爲什麼：因爲？

（一）一般地說：在殖民地 and 附屬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上，特別是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上，那時候，革命的鋒芒主要地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時候，民族資產階級還贊助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是必要的和相當的。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經驗和事實證明正因爲採用了這種策略，年輕的共產黨才能夠在全體人民面前表明自己是爲全民族解放而奮鬥的力量，於是才能夠很快地由很小的宣傳小組變成了羣衆的政黨，正因爲採用了這種策略，中國共產黨才能夠以很快的速度來教育和組織千百萬的工農羣衆把農民引導到土地革命的道路，

現在由於日寇侵略而造成的特殊歷史環境，在中國人民方面，除了團結一切力量共同抗日以外，沒有其他救國自救的方法，而在中國共產黨方面除了建立民族反日統一戰線這個政策以外，沒有其他任何能夠動員和組織全中國人民去實行抗日救國的辦法。

(二)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黨的六次大會和共產國際六次大會，不僅沒有指責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採取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恰恰相反，黨的六次大會和共產國際六次大會，都贊成這個策略，並且承認他的寶貴的教訓和經驗。黨的六次大會和共產國際六次大會所指責的，只是陳獨秀等將反帝民族統一戰綫策略作機會主義曲解的錯誤，就是把無產階級為中國人民利益而與民族資產階級共同行動去反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策略，變成了使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服從資產階級利益的策略。

(三)當一九二八年黨的六次大會和共產國際六次大會舉行的時候，中國革命運

動正處在低落的時期。民族資產階級奪取了國民黨而走進了反革命的營壘，小資產階級暫時離開了積極革命鬥爭的地位。共產黨依靠了而且只能依靠工人，農民和貧民。統一戰線並不是由共產黨破壞的，而是由希望與帝國主義勾結的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破壞的。現在日寇的侵略不僅威脅着勞動者和小資產階級，而且威脅着很大一部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共產黨繼續依靠工人和農民，但同時必須設法運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的力量。

此外現在統一戰綫是建立在新的基礎上：中共已經成了羣衆的政黨，在建立統一戰綫的鬥爭中，黨依靠着紅軍和蘇維埃區域的力量。因此，中國共產黨今天採取與國民黨和其他組織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絕不是重複一九二五——二七年陳獨秀等機會主義的錯誤。

(丙)關於組織抗日聯軍問題。

第三、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須要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全中國統一的

抗日聯軍，應當是紅軍與國民黨軍隊及其他軍隊根據共同反日武裝鬥爭的政治協定而組成的聯合軍隊。每個參加聯軍的隊伍。担任全部戰綫中的一部分防綫，在完成總的抗日軍事計劃時，均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但同時所有參加的武裝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組織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軍官成份和政治工作人員成份。

沒有得到同盟軍方面自願的同意，任何一個參加聯軍的部隊，沒有權利去干涉另一參加部隊的內部事情。

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所謂用『國民黨改組紅軍』的方法，來組織紅軍中南京國民黨軍隊的抗日聯軍。關於這一點，中共公開宣佈：爲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利益，中共不能同意任何人來『改組紅軍』，因爲把紅軍和南京軍隊混合，就是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消滅中國人民反日武裝鬥爭中最可靠的武裝力量，這只是與日寇有利而與中國人民和國家有害的事情。

中國共產黨員應當很清楚的了解在爲建立全中國抗日聯軍而奮鬥的條件之下，或紅軍已經參加抗日聯軍的條件之下，中國共產黨不僅不應當絲毫允許減低紅軍戰鬥力，恰恰相反，黨應當比前此任何時候都更加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更加强紅軍的實力，更加鞏固和加強紅軍的統一，紅軍的純潔紅軍的紀律和紅軍對革命對勞動羣衆事業的絕對忠實。因爲建立全中國抗日聯軍和武裝抗日鬥爭的結果如何和成敗怎樣，首先就要看這個最先進，最覺悟，最富於鬥爭力的全中國人民和全中國所有軍隊的武裝先鋒隊——紅軍的戰鬥力和實力如何而決定：紅軍越強大和越有力，則建立全中國抗日聯軍的事業便越容易和越快，則真正地嚴重地抗日武裝鬥爭的實行和勝利，也越有保證和越有希望。

建立全中國抗日聯軍和進行嚴重的武裝抗日戰鬥的第一個重要的條件和前提，便是停止南京軍隊和紅軍之間的內戰。如果不停止這兩大武裝力量之間的戰爭行動，那就談不上真正組織全中國的抗日聯軍或進行真正的嚴重的順利的武裝抗日鬥爭

。因爲如果國民黨南京政府經常把國家大部軍隊和國家大部財政收入都拿去進行反對紅軍的戰爭；那麼；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有什麼方法能夠真正進行抗日的準備呢？同樣，如果紅軍經常遭受蔣介石不斷的軍事圍剿，那麼，紅軍還有什麼力量去進行武裝抗日的鬥爭呢？如果在中國這兩大軍事力量之間經常的進行內戰，那麼，中國人民那能有真正強有力的武裝力量去抵抗日寇呢？正因爲從這種實際情形和中國人民利益的觀點出發，所以中國共產黨員堅決反對國民黨有些領袖所持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觀點，因爲這種觀點，只是使中國內戰繼續開展，因此，也就使團結中國人民一切力量去抗日救國成爲不可能。

正因爲如此，所以中國共產黨堅決提出：『驅逐日寇出中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中國軍隊不打中國軍隊』等口號。

正因爲從必須團結中國所有軍隊共同抗日的這個觀點出發，所以中國紅軍及其領袖毛澤東，朱德等同志，從一九三三年起，特別是從去年八月起，再三地向國民

黨軍隊及其總司令蔣介石提出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和簽訂抗日協定的提議。雖然蔣介石和南京軍隊的指揮官直到現在還繼續進行反對紅軍的軍事行動；但無論如何，紅軍要努力達到南京國民黨軍隊及中國其他軍隊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目的，中國紅軍和全體中國人民熱烈希望立刻停止中國一切內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僅希望立即停止紅軍與國民黨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而且同樣希望一方面立即停止和避免國民黨內各派別之間的戰爭（例如現在在南京國民黨與西南派國民黨之間的戰爭），另一方面避免國民黨與其他非國民黨軍隊之間的戰爭。在現在中國條件之下，任何的內戰，自覺地或不自覺地，那是幫助日寇實行「以華滅華」的毒計。關於這一點，最顯明不過地便是日寇在南京與西南之間最近武裝衝突中所進行的公開的挑撥離間的作用。但是，非常可惜得很，南京和西南雙方，在這一次都中了日寇的奸計。中國共產黨很希望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這種陰謀和挑撥離間的勝利，是最後一次的勝利。

有些人用這樣理由來反對紅軍與南京軍隊建立反日統一戰線，就是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員不能與舊敵蔣介石建立任何聯系。關於這種理由，應當回答說：我們與蔣介石並不是私仇，我們的仇恨，是建築在我們與蔣介石對中國政治生活的一切根本問題的觀點不同和分歧上，我們擁護中國人民和國家的利益，而蔣介石進行與國家和人民有害的政策。因此，如果蔣介石今天能夠同意與我們進行共同鬥爭去反對外國仇敵對於我們國家和人民利益底侵犯，那末，為的反對共同的和強大的敵人，為什麼中共不可以與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呢？

(丁)關於國防政府問題

第四、民族統一戰線需要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應當是一切參加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黨派和組織的真正的代表機關，這就是說：

一、這個國防政府應當是真正的全中國的政權機關。

二、這個國防政府應當是真正嚴重的注意保護本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領土、

主權使之不受外敵侵略的政府；就是說，能夠真正實行國防任務的政府；在現在條件下，他應當是實行武裝驅逐日寇出中國的任務的政府。

三、這個政府不是任何一黨一派的政權，而是反日民族戰線的政權，即是說，是一切參加反日人民統一戰線的黨派，根據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利益和一般條件，以根據每個參加黨派和團體的願望和意志，而由各黨派全體或一部份實行參加的政府。

五 爲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

由此，當然很自然的發生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對於中國那些現在存在各種府怎樣辦呢？例如：中央蘇維埃政府，南京中央政府以及其他名義上是地方政府，實際上不服從任何中央政權的政府等。中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爲的使已經組成的政府，首爲真正全中國的和真正有國防力的政府，那就必須把全國政權集中在一個

中央政府手裏，就必須消滅中國政治上和行政上不統一的現象；換句話講，就是取消中國一切現存的政府，把所有政權集中在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手裏。但是，在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未成立以前，在由普選權選出的全中國的國會未組織真正完全中國統一的政府以前，這種政權集中的辦法是不可能的。

此外，如果有人問我們共產黨員說：中共是否繼續爲中國蘇維埃和蘇維埃政府而奮鬥呢？那麼，中共對這一問題很清楚明白地回答說：不僅在理論上和思想上，我們堅決地相信，只有蘇維埃能夠救全中國人民和全人類；而且蘇聯的事實和經驗已經完全證明了，只有蘇維埃能把一個貧弱的和沒有國防力的國家，變成富強的和有國防力的國家；只有蘇維埃能夠把一個政治上和文化上落後的國家，變成一個先進的自由文明的國家；只有蘇維埃能夠把經濟上落後和貧窮的國家，變成先進的和富有的國家；只有蘇維埃能夠把一個各民族經常互相仇視對立和不信任的國家，變成真正的各民族大聯合和各人民互相友愛的國家；只有蘇維埃能夠給予人民這樣

歷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例如最近蘇聯頒佈的著名的斯太林的憲法草案一樣。同時，中國人民一部分最優秀的子弟，已經爲蘇維埃政權而流血奮鬥九年了，中國蘇維埃區的事實和經驗也已經開始證明了：蘇維埃政權在各方面都勝過中國過去幾千年歷史上所有的各種封建君主的和軍閥官僚的各種形式的政權。雖然如此，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人民利益的需要，估計到蘇維埃區還不過佔中國廣大領土的一小部分這件事實，估計到中國人民中還有很大一部分今天還不贊成蘇維埃這件事實，特別估計到在中國的空前民族危機條件之下，須要最迅速地找到團結全中國的一切民族力量和民生力量共同抗日救國的方法和道路這件事實，中國共產黨宣佈：中國共產黨贊成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贊成召集用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全中國的國會，贊成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在現在條件之下，這是團結中國人民中一切民族力量和民主力量去抗日救國的最好方法。

什麼是真正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呢？這是這樣一種共和國，牠能夠克服

中國政治行政上的分裂的現象，牠能夠消滅軍閥割據和不斷軍閥戰爭的局面，牠能夠在國內建立和平及安寧的秩序。牠能夠成爲團結，動員和組織全中國的人力、財力、物力、武力去爲反對外敵而奮鬥的基礎。

這個共和國真正保護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保護一小的寄生蟲的利益。在這個共和國內，有無上威權的應當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軍事獨裁者的爲所欲爲。中國共產黨贊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這個共和國裏，人民有一般的民主權利和民主自由，人民有工作和受教育的權利，人民有身體，財產、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示威、思想、學習的自由，有信宗教和宣傳反宗教的自由等等。

什麼是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全中國的國會呢？爲什麼要召集這種國會呢？

這種國會應當是真正全中國人民的代表機關。即是說：這種國會應當是由這樣一種真正普遍的和真正民主的選舉法選舉出來的。根據這種選舉法，中國所有公民，無種族、民族、性別、黨派、宗教和地域之分，都有權利參加國會的選舉和被選

爲國會的議員。

這種由真正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全中國的國會，不僅與現在國民黨的各種所謂選舉出來的而實際上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指定的那些會議和立法機關（例如：一九三一年南京召集的所謂國民會議，一九三二年召集的所謂國難會議，或者今年十一月間預備在南京召集的所謂國民大會等），沒有絲毫相同之點；而且與過去袁世凱或曹錕吳佩孚當權時代所賄選出來的所謂國會，也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相同之點。

統一的全中國人民共和國所以有召集這種全中國國會的必要，因爲這種國會是全中國人民最有威信的代表機關，牠應當對於中國內政外交的一切根本問題（例如：鞏固和加強國防力的問題，土地農災問題，勞動問題，政治救水問題，財政和稅收問題，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問題，改良國民教育人民和衛生問題等），作詳細的討論和通過相當的決議和法令。此外，這個國會之所以有召集的必要，就是因爲牠

應當規定和通過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根本法——憲法。

中國人民今天的確需要憲法，然而他所需要的並不是這樣一種憲法，譬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預備在今年十一月南京舉行的所謂國民大會來通過的憲法；這種憲法，無論在形式和實際上，都不是全中國人民的憲法，而只是國民黨一黨的憲法。中國人民須要另外一種憲法，那個憲法真正保護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

中國共產黨員宣佈：在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組織國防政府的條件之下；爲尊重中國大多數人民的願望和意志，蘇維埃區將加入這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成爲其組成的部份，蘇維埃區將選舉代表參加這個全中國的國會，在蘇維埃區裏，將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政治行政制度。

然而，在這種共和國沒有成立以前，中國共產黨絲毫也不容許減弱蘇維埃政權的力量，蘇維埃不僅是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且主要的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權。我們將用一切方法去鞏固蘇維埃政權的威信和力量，首先是用擴大蘇維埃政權與蘇

區和非蘇區的廣大民衆的聯繫這種方法，來鞏固和加強蘇維埃政權的威信和力量。在這種共和國沒有建立以後，蘇維埃之所以有鞏固的必要，因為蘇維埃是唯一的人民的政權和民主的政權，因為蘇維埃是為建立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統一戰綫的團結核心，因為蘇維埃區是中國人民為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的主要動力之一，蘇維埃區域將是這個民主共和國的最主要的最可靠的支柱之一，以及最鞏固的和最自由的組成部份。

中共現在贊成建立這種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是完全自覺的和自動的，因為這種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對於中國人民和國家是一個大的進步，是使中國人民和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自由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步驟。這種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將千百倍地鞏固，加強和增加中國人民和國家反對外國敵人的國防力。

有些自命為民主主義代表的先生們，現在曉得中共為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的立場以後，大概又要像在去年看見中共在八一宣言上提出『為祖國

生命而戰」「爲民族生存而戰」「爲人權自由而戰」等口號之後一樣，又要大叫「民主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了。對於這種意見，應當回答說：「先生們，你們的意見是不對的。你們完全不了解或者有意不了解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相互關係，或者更正確些說，共產黨員對於民主主義問題的觀點你們完全不正確的斷定說，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都反對一切民主而只贊成專政的。不對的，共產黨員無論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絕沒有把專政和民主看成互相對立的東西，或者把民主與專政看成互不相容的東西，恰恰相反，共產黨員經常能夠指出民主與專政互相之間的內部聯繫。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時候，絕不是原則上反對一切民主，就是對於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也同樣的；雖然比起蘇維埃的民主來共產黨員批評資產階級的民主在實際上只是少數有錢人的民主，同時，是這些少數有錢人對大多數勞動羣衆的專政；同時，指出蘇維埃的民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是真正大多數人民的民主；但同時，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與封建制度或反社會的法西斯主義比較起來，共產黨承

認資產階級民主對工人階級和社會發展是一種進步，因此，共產黨員站在第一條戰綫上去反對中世紀的黑暗勢力和法西斯蒂對於資產階級民主權利底侵犯。在這方面，我們光榮的法國和西班牙的兄弟黨，用自己英勇鬪爭來保護人民戰綫和共和國，來反對法西斯蒂，給了全世界人們以不可否認的證明和實例。」

由此可見這些自命爲民主主義代表的先生們，關於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互相關係，以及共產主義對於民主主義的觀點底了解，是完全不正確的和絲毫沒有根據的。這種觀點，與科學的共產主義對這些問題的觀點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我們可以誠懇地向這些先生們說：「如果你們真正是民主主義的代表，那麼，就請你們少說些什麼「民主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空話，請你們與中國人民的一切民主力量一起，爲建立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吧。」

在結尾的時候，我們應當指明，就是有些人說中國共產黨的新政策不是一種真能實現的政策。我們回答說：這是不對的，我們的新政策是真能實現的政策，爲什

麼？因爲：

一、中國共產黨十五年的歷史可以堅決地說明這一點，請看一看中國共產黨十五年來的經驗和事實吧！當一九二二年和二三年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實際上還有一個很小的宣傳小組，而國民黨當時實際上也還不是一個真正有組織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員在那個時候提出了建立民主統一戰綫（一九二二年）和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綫（一九二三年）的政策，提出了以國共合作方法來實現建立中國人民反帝統一戰綫的政策。那時候誰不以爲中國共產黨這種政策是不能實現呢？但是結果怎樣呢？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歷史事實和經驗證明：青年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完全能實現的。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反帝國主義民族統一戰綫建立起來了。正因爲這一點，結果才產生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當一九二七年底革命失敗以後，特別是廣州公社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員到處是種臨時被打敗了的軍隊，而在這個時候，中共宣佈爲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紅軍而戰鬥的政策。那時候，誰不以爲我們

的政策是不能實現的呢！大家都還記得：不僅帝國主義和國民黨，也不僅托洛茨基和陳獨秀派異口同聲地宣佈共產黨的政策是一種烏托邦的幻想；而且在我們自己隊伍當中，對於這種政策的實際性，也有過勇氣不夠和信心不足的某些人。然而結果怎樣呢？中國共產黨九年來為蘇維埃和紅軍而奮鬥的歷史的實際和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建立了蘇維埃和紅軍的政策，是一種真正的和實際政策。紅軍蘇維埃在國家的一部份領土已經存在和發展幾年了，雖然直到現在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結果和勝利。

現在，當中共宣佈為建立反日和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而奮鬥的新政策的時候，及遇見了一些說我們政策不能實現的人們。中共將蘇維埃區域政策加以相當的改變，使之能更適合于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中共在全中國各方面為建立人民反日統一戰線而奮鬥的事實，可以具體證明中共新政策的誠懇性和真實性。我們完全相信：在最近的將來，歷史又要嘲弄這些空談家的預言和

空話，又要證明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正確。

關於我們新政策的實際性，也可以拿我們法國和西班牙兄弟黨的事實和經驗來證明。當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法國西班牙兩黨代表團在共產國際七次大會上，宣佈在這些國家內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尤其是建立人民戰線政府的時候，難道笑罵我們共產黨員這種政策是玩手腕和烏托邦的人還少嗎？但在這些國家的經驗和事實怎樣呢？不僅反戰反法西斯蒂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建立起來了，而且人民戰線政府在這些國家裏也建立起來了，我們法國的同志，不僅在爲建立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的鬥爭中，表現出非常的積極性誠懇性和戰鬪性，而且在爲建立人民戰線政府的鬪爭中，以及在爲保存和鞏固統一戰線人民戰線和人民戰線政府的鬪爭中，他們表現出對自己政策模範的忠實性和絕對的切實性，關於這一切，可以由他們的『一切爲人民戰線和一切經過人民戰線』等口號和行動作證明。我們西班牙的同志們，在爲建立統一戰線人民戰線和人民政府鬪爭中，與法國同志們一樣表

現出自己的誠懇性和戰鬥性，而且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頭顱，在最前綫上與共和黨員，社會民主黨員和無政府主義者手携手地反對賣國賊和人民公敵——法西斯蒂的暴徒，反對這些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在西班牙的走狗，爲保護西班牙共和國和西班牙人民的獨立和自由。

二、中國人民擁護和相信我們共產黨員。我們共產黨員是中國人民骨肉之親的同胞，我們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兒女，我們最忠誠地保護中國人民的利益，我們的政策，不過是在某個一定歷史時期內中國人民的意志和願望及總的和具體反映，因此，我們堅決相信中國人民對於中共政策的擁護和信任，而這種擁護和信任，便是一切政策能夠實現的保證。

三、全世界無產階級和民衆同情贊助我們的新政策，我們的新政策，不僅是中國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確的政策，而且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民衆反戰法西斯蒂擁護和平，爲自由，爲民主而奮鬥的整個世界政策的一個直接的組成部份，因此，不僅共

產主義的同情者，而且社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的，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工人和勞苦羣衆，以及全世界的一切反對戰爭愛好和平的人士，都不可避免地對我們的新政策表示同情和擁護。

四、『幹部決定一切』（斯大林）。在我們黨十五年的歷史鬥爭過程中，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爲民族統一戰線和土地革命的英勇鬥爭中，在最艱難困苦的反對中國人民內外敵人秘密鬥爭條件中，在游擊爭鬥和革命國內戰爭的火焰中，中共鍛鍊出了成千累萬的忠實的、堅強的、和能幹的幹部人材。不僅有能幹的黨和羣衆工作的幹部，而且有許多天才的管理國家的人材和指揮軍隊的專家，這些幹部爲執行黨的新政策的忠實、耐勞、澈底和智慧，便是一切事業基本底基本。

（完）